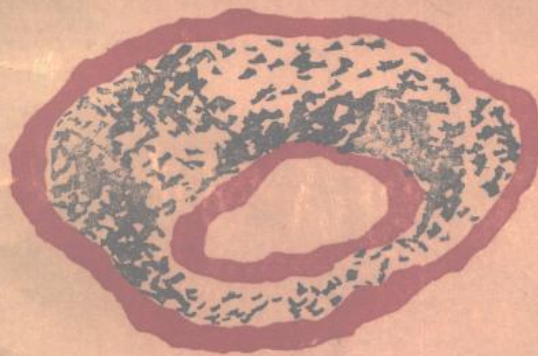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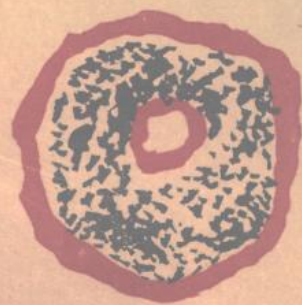


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

——中国与美洲历史联系论集

罗荣渠著 重庆出版社



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

——中国与美洲历史联系论集

罗 荣 渠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1988·重庆

1153862

责任编辑： 刘世龙

封面设计： 士 由

罗 荣 渠 著
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

——中国与美洲历史联系论集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插页2 字数180千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900

ISBN 7-5366-0373-8

K·23

定价：2.25元

1478/12

自序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之一。但在哥伦布以前是否有人从旧大陆到过美洲（指有史时期从亚洲移殖美洲），却是一个“世界之谜”，众说纷纭。爱猜谜似乎是人们常有的一种思维乐趣，不分老幼皆如此。数百年来，爱好探索历史之谜的人中，不少人喜欢去猜哥伦布以前有谁到过美洲这个谜，而谜底却多得难以想像。中国人最先发现美洲说，即是谜底之一；而被认为最先发现美洲的中国人，又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我被这个问题所吸引，是在60年代初。当时偶然从《知识就是力量》这本杂志上读到一则译自俄文的小资料：《比哥伦布早1000年》。后又读到马南邨在《北京晚报》上“燕山夜话”栏连载的几篇短文，对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作了新考证。文章虽短，影响很大，是意料中事。因为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重大意义虽比不上哥伦布的“发现”，但在时间上早1000年，的确是可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于是我开始研读有关资料，很想进一步论证，找出地理发现史上的中国哥伦布。但对前人在这个问题上列举的论证稍加探索，就发现问题很多，难以立论。结果反而迫使我去做与原来意图相反的工作，即证伪的工作。这就是我的第一篇论文《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产生的经过。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非常重视证伪的工作，认为是科学理论所必需。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不经过严格的批判的验证，都只能算是一种假说和猜想。自不待言，我所做的证伪的文章不是一般报刊所感兴趣的。80年代初，海外传来美国加州海岸外水下发现“石锚”的消息，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公元前一两千年中国沉船的遗物，可作为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的新物证。“石锚”的新闻不胫而走。一个未经任何证实的假说却引起报刊的极大兴趣。一时对外广播、科普读物、甚至历史著作中都广为引述。就连一位喜爱中国文化但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对《山海经·大荒东经》的臆说，也引起不少人的兴趣。据说有家外国电影商想来中国拍摄一部以中国人发现美洲为主题的电影。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重新参加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写出了第二篇论文：《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第二篇文章提出的论点引起了史学界朋友与读者的注意。后来该文获得《历史研究》第一届优秀论文奖。这说明，所讨论的问题确是学术界所关心的。当然，不同意的文章和论点也是不少的。这是学术讨论的正常现象。我并不认为这些初步的探索可以解答这个复杂的历史难题，但却可以帮助我去学会论证一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科学方法，锻炼自己的科学思维的能力。果然，这次锻炼使我得到一些提高。中国人发现美洲说的主要论据是《梁书》上有关扶桑国的一段传闻史料。这是研究问题的关键。我的看法是，这段史料疑点甚多，即使当成可信的史料使用，估计扶桑国的地理位置也不致超出东北亚包括日本列岛在内的范围，绝不可能在美洲。在第二篇论文中我补充一新的推测，认为扶桑国也可能在从印度经西域到中国内陆的广大地区内的某处，意在把搜索扶桑国的范围扩大一些。不料这一立论受到了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同志来信提出批评，认为是“画蛇添足”。经过思索与讨论，我

接受了这一批评，在修订稿中删掉了有关第二种推测的全段论述。由此表明，在试图反对某种不严谨的说的论证中又可能引出新的不严谨的说的，从而可能使问题节外生枝，可见贯彻科学的分析与推理实在不易。

大凡被称为是什么“世界之谜”一类的问题，总是在研究者和读者中具有经久不衰的魔力的。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也是如此。这个问题最早并不是由中国人提出来的，而是由一位法国汉学家提出来的。但这个问题从本世纪初传到中国以后，就一直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大致平均每隔20年要引起一次讨论：20年代初有人在《地学杂志》上提出《美洲为古樺木地说》；40年代初朱谦之教授出版《扶桑国考证》；60年代初马南邨引起“谁最早发现美洲？”的新讨论；到80年代初，由于美国加州“石锚”的出水，在我国学术界可说是引起了一次讨论美洲发现问题的小小的热潮。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不足为怪。因为大约每隔20年总会有些“新发现”出土，也总有一批新生力量投入我们的学术界，他们对于过去的人们所研究过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抱有新的探索兴趣，因此旧问题必然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提出，重新讨论。选编这本小册子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存一些资料，好让后来的研究者了解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有过一些什么争论，从哪些方面进行过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果，还存在些什么难题。这样，就可以避免去做一些重复劳动，有利于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

在本书的附录里，收入了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的几篇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不同的文章，供读者对照参考。马南邨的文章收入《燕山夜话》，此书发行量大，故不再收入。夏鼐同志与作者讨论扶桑国问题的几封通信是第一次发表，有必要略加说明。夏鼐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属于我的老师一辈。但我在北大念书时他

还未在历史系执教，因此我从未见过他。这些通信最初是这位学术前辈出于对后学的关怀，主动写信给我，指出拙文的一些缺点错误。于是我开始用通信方式向夏鼐同志请教。他尽管工作非常忙，每次总是迅速亲笔作复。记得在有一次通信中，我寄去《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一文的修订打印稿，只请他将修改的段落加以过目。不料在寄来的回信中，除了提出中肯的评论外，还附有他亲自校订该稿的一份勘误表。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他的来信长短不一，多是在百忙中草成，写得亲切坦率，观点鲜明，言必有据，使我获益良多。我曾几次想到夏鼐同志的工作地点去当面求教，都因故推迟下来，后来因忙于别的研究项目而把拜访的事长期后推。一直拖到在报上读到 he 逝世的消息，我才深自恨晚，感到是无可补偿的憾事。现在把他与我的学术通信公诸于众，是为了让广大读者了解夏鼐同志在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也是为了对这位未曾见过面的学术前辈表示深切悼念之意。

收入本书的论文中有两篇是论述哥伦布以后时期即16世纪到19世纪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这是真正有纪录可查的越太平洋联系。过去治中西交通史的学者，几乎都是偏重于研究中国与欧亚非各国间的交往关系，很少有人研究太平洋上的海上交通与越洋联系。19世纪的华工即苦力移民问题，过去国外有人做过一些研究，但一般研究的范围都很狭窄，研究的方法也较单调。近年来，国内史学界从华侨史的角度对中美和中拉关系的研究日益重视。由陈翰笙同志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已基本出齐（中华书局），书中公布的一部分我国历史档案资料是初次发表，将有助于推动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呼吁今后能有更多的档案史料整理公布于世。随着太平洋地区的国际重要性日益增长，对这个地区的研究（其中包括历史交往的研究），必然会逐

步加强。但对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单靠我国史学工作者的努力还是不够的，在这方面，加强国际学术界的联系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与美国的历史联系是中国与美洲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这方面的问题拟另行讨论，本书中未收入有关文章，特此说明。

科学研究需要百家争鸣，而百家争鸣又必须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科学研究愈充分，百家争鸣才愈加深入，愈接近探索的真理。这个集子只是个人探索的粗浅尝试，许多问题都还有待于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待于考古学特别是海洋考古学的新进展。这个集子中所提出的这样那样的论点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推倒，但只要这些论证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探索态度得到肯定，严谨的科学的历史方法引起重视，这些探索的主要目的就算达到了。

罗 荣 渠

1986年4月于北京大学中关园上下求索书屋

目 录

自序

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	(1)
旧问题的新提出.....	(1)
驳所谓扶桑即墨西哥说.....	(4)
中国史籍中的扶桑国史料的重新估价.....	(21)
扶桑国何在?	(30)
洋汉学中的殖民主义毒素必须批判.....	(32)
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	
——兼论文化传播问题.....	(37)
一份慧深的假履历表.....	(38)
一个虚构的美洲扶桑国.....	(41)
一种并无实现可能的航海可能论.....	(44)
一些尚未“水落石出”的“石锚”.....	(49)
扶桑国的史料估价和方位探测.....	(54)
(研究美洲文化起源涉及的一个理论问题.....	(62)
世界之谜	
——谁在哥伦布之前到过美洲?.....	(70)
探索新、旧大陆联系问题的历史回顾.....	(70)
扶桑国以外的新猜想.....	(74)

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初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

联系	(87)
马尼拉商帆贸易开辟了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	(88)
“丝绸之船”到美洲	(98)
远越大洋的文化接触	(105)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感受到的美洲影响	(113)
中国与美洲早期历史联系的一点启示	(121)
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的中国“苦力移民”	(124)
从“丝绸贸易”到“苦力贸易”	(124)
运往拉丁美洲的华工人数及分布概况	(128)
“自愿出洋”的真相与海上死亡率	(133)
华工在美洲的次奴隶地位	(137)
“无法估价的拓殖者”	(144)
华工与古巴独立战争	(150)
关于“苦力贸易”被废止的问题	(156)

附录

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	朱谦之 (159)
关于慧深	汤用彤 (176)
扬帆美洲三千年——殷人跨越太平洋初探	房仲甫 (181)
扶桑新释	景振国 (185)
帕洛斯·维尔德半岛的中国石锚之谜	F·J·弗罗斯特 (198)
论美国加州深海发现的圆饼形中心穿孔石器	(205)
考古学家夏鼐与作者论学的通信	韩振华 (218)
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基本参考书目	(227)

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

旧问题的新提出

早在二百年前,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吉涅(J. de Guignes)在向法国文史学院提出的研究报告《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亚洲极东部的几个民族的研究》中,最先提出了新奇的“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说”。到十九世纪中,曾引起西方汉学家的广泛兴趣和热烈讨论。1831年,德国东方学家克拉卜洛特(H. J. Klapproth)发表《关于中国文献中所载扶桑国被误认为美洲的一部分的说法的研究》,第一个反驳了德·吉涅的论点,认为扶桑国应在日本或萨哈林(库页岛)。此后,支持德·吉涅论点的学者和反对他的论点的学者,分为两派,反复论辩。许多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参加了讨论。据我们所知,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论文和专著,即有三十余种之多^①。其中,赞成派方面的最著名的巨著,当推1885年艾·文宁(E. P. Vining)所写的《无名的哥伦布,或慧深与来自阿富汗斯坦的佛教僧团于五世纪发现美洲的证据》一书,长达七百余页,旁征博引,断定扶桑国即古代墨西哥。在反对派方面,最有力的著作当推希勒格(G. Schlegel)的《扶桑国考证》,他认为扶桑国在库页岛。虽然经过长期的争论,但对这

^①参阅H.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西人论中国书目) vol. IV, 2653—2658, 3217页; vol. V, 4247页。1928年北京文殿阁书庄影印本。

个问题迄今未闻有什么一致的结论，近几十年来这个问题在国外很少有人提到了。

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的问题，在解放前也曾引起过我国学术界的注意和兴趣，论者不但都同意德·吉涅和文宁的说法，而且还根据中国史籍，把中国人前往美洲的时间提前了几世纪，甚至推到远古。例如，章太炎就提出法显发现西半球的新说。他根据《佛国记》所记法显在南海航行遇风飘至耶婆提国的史实，认为耶婆提即南美的耶科陀尔（厄瓜多尔）^①。此说把中国到达美洲的时间从五世纪末提到五世纪初。1920年，又有人提出“美洲为古幡木地说”^②，作者据《史记》五帝本纪言帝颛顼高阳“东至于幡木”，断言幡木即扶木，即扶桑之地。这样，就进一步把中国和美洲的历史联系上溯到纪元前若干世纪。后来，更有人把殷民族东迁、襄亮征北匈奴等事迹，也和美洲发现硬拉在一起，穿凿附会，极尽其能事^③。到1940年，朱谦之先生著《扶桑国考证》一书，根据中外史籍材料进行了新的考证，结论是中国僧人发现美洲是“决无可疑”^④。这是国内研究扶桑国问题的最详尽的一本著作。

解放后，一直到1961年9月《北京晚报》上发表了马南邨同志的《谁最早发现美洲》等三篇短文，再次提出这一问题，才使这冷落了许多年的老问题重新引起学术界的兴趣^⑤。

①《法显发见西半球说》。见《章氏丛书》别录卷三，上海右文社印本第24册，第107—111页。按“厄瓜多尔”系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后有之新名，故此说早被完全驳倒。

②陈汉章：《美洲为古幡木地说》，《地学杂志》，1920年4月号。按此说日本学者白岛库吉在《论扶桑国》（日文《地学杂志》1907年9月号）一文中即已提出。

③陈志良：《中国人最早移殖美洲说》，《说文月刊》第1卷，1940年。

④朱谦之：《扶桑国考证》，香港商务，1941年，第121页。

⑤马南邨的这些短文均收在《燕山夜话》二集（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朱谦之最近重申了自己原来的论点，参看1962年5月25日《文汇报》发表的访问记：《谁最早发现美洲？》和1962年6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

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从提出来到现在，讨论时间甚长，参加讨论的人也甚多且广，结论莫衷一是。就扶桑国的位置来说，最早德·吉涅推定在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地方，而他的附和者如诺曼（C.F. Neumann）等人却多指为现在的墨西哥地方（古代阿兹特克文化的发祥地）；但是在更后的论证者中，则不仅大量引用中美尤卡坦地区的马亚文化的材料，而且把南美的印加文化的某些遗迹与扶桑国或中国文化联系起来^①。在反对扶桑国在美洲的论敌中，有人推测扶桑在库页岛，也有人推测在日本的东南。至于最早前往美洲的亚洲人是哪国人，多数人都说是中国僧人，但也有人说是印度人、日本人；也有人不论其国籍而称之为“佛教徒”。至于亚洲人发现美洲的时期，也是众说纷纭。

为什么关于扶桑国问题的讨论中各种意见的分歧如此之大，争论如此之久呢？除了由于“文献不足征”所造成的困难外，主要是在于研究者缺乏严谨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往往从主观臆测和模想立论，穿凿附会，各执一端，因而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主观随意性。在研究方法上，是孤立地将一条一条的史料进行生硬的比附；同时对于史料的选择也很不谨严，将可靠的史料与不可靠的史料甚至神奇志怪之书混淆不分。这种研究方法，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研究中占着统治地位，因而在早期的西洋汉学研究中也充分地反映出来。

列宁说：“诡辩家抓住‘论据’之中的一个，但是黑格尔说得很对，人们完全可以替宇宙万物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②列宁的这一重要指示对于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既然今天把扶桑国

^①Charles G. Leland: *(Fusang or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扶桑或美洲的发现), 1875年伦敦版。

^②《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4页。

的问题重新提出来进行讨论，我们认为，就不能把这个讨论还局限在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汉学家们的“研究”基础之上，而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对西洋汉学家们的全部“研究”，从方法论到史料考证，从其科学性到其目的性，重新加以批判和估价，才有可能真正弄清楚所谓扶桑国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从而有助于在新的基础上来进行研究和讨论。

驳所谓扶桑即墨西哥说

中国正史中关于扶桑国的记载，最早见于《梁书·诸夷传》（卷五十四、列传四十八）。以后正史中的记载，如《南史·夷貊传》（卷七十九）、《通典·东夷》（卷一八六）、《通志·四夷传》（卷一九四）、《文献通考·四裔考》（卷三二七）所记之扶桑，均本《梁书》。因此，《梁书·诸夷传》可说是研究扶桑国问题最早的原始材料。其他野史记载，都是神话、传奇之类，荒诞不经，不足为据（它们和《梁书·诸夷传》的关系，将在下节论述）。

为便于研究，兹将《梁书·诸夷传》有关扶桑国的记载，全文录下，并加标点符号和个别校订。

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普通中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录焉。

.....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铜（《南史》作“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

为布，以为衣，亦以为帛。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饮宴，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吐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南史》作“赤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缙经。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①

历来认为扶桑国在古代墨西哥或反对这一说法的人，都是根据上述这段史料作为研究和考证的中心的。现在我们也根据上述史料所述内容，分为五个方面来进行考察，并评述前人提出的说法。

^①《梁书》，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七册，8072[454]—8073[455]页，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1. 地理位置 按《梁书·诸夷传》所记之东方国家，排列顺序为：高句骊、百济、新罗、倭、文身国、大汉国、扶桑国等国。《梁书》对各国所在的地理方位有明确记载：“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而据慧深之言，“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德·吉涅等人据此从倭国（即日本）向东北和东方推算，考证出文身国即日本东北之虾夷所住地方，大汉国即今堪察加地方（文宁认为文身国在阿留申群岛，大汉国在阿拉斯加地方），从而推测扶桑国的地理位置应在今美洲墨西哥太平洋岸地区。

从地理位置上论断扶桑国应在墨西哥，是主张中国人发现美洲说者所持之最有力的论据之一。表面上看来，似乎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梁书·诸夷传》的地理记载的准确性和全面地考虑一下当时的交通条件，就很难认为上述论点站得住脚了。

中国古籍中的交通里程计算，特别是方域之外而尤其是海域之外的地理计程数字，其科学性是很可怀疑的。这可说是一个常识。不说别的史籍，即以《梁书·诸夷传》关于倭国的地理位置的记述为例，这个记述是相当详细的：

“倭者……去带方万二千余里，大抵在会稽之东，相去绝远。从带方至倭循海水行，历韩国，乍东乍南七千余里，始度一海，海阔千余里，名瀚海。至一支国，又渡一海，千余里，名未卢国。又东南陆行五百里，至伊都国，又东南行百余里至奴国。又东行百里至不弥国。又南水行二十日至鞆马国。又南水行十日，陆行一月日至邪马台国，即倭王所居。”

据上述可见，《梁书》所述的倭国的地理方位是大致正确的，但所记的里程却很不可信。中日两国相距海距不超过600哩（约合2,200多里），而《梁书》却称相距“万二千里”，“相去

绝远”。即使绕道朝鲜兜一个大圈子到日本，也还是差不了这么多。据《梁书》所记录的海陆行程来推算，非数月不能至。设若读者不知倭国即日本，而按德·吉涅等人的推算方法，倭国岂不也该在美洲或至少在太平洋上遥远之处么？《梁书》对于临近我国并与南朝交往至少有八次之多的倭国之地理记述，尚夸大失实至此，其所记扶桑国的地理方位和里程，当然更不足征信。这种计算的失实和夸大是可以理解的。在五、六世纪之时，我国和西域方面的陆路交通虽然已相当频繁，对当时世界的地理知识也日益扩大，但我国东境界临大海，当时航海技术还很低，海上交通很少，因而航海计程的方法也很幼稚，往往以船只漂流的日月计算。正因为如此，我国各民族的早期活动往往是“东至于海”。晋人张华《博物志》云：“汉使张騫渡西海至大秦，……东海广漫，未闻有渡者。”^①从而关于东海之外的记述，大都是海客谈瀛，多推测和传闻之词。

了解《梁书》关于我国东邻诸国地理计程之不可靠，可以肯定，如按《梁书》所记中日两国的距离的同一尺度来推算扶桑国的地理位置，决不可能远在美洲。即按德·吉涅和克拉卜洛特等人的说法，大汉国的位置大致可划定在库页岛到堪察加半岛的范围内，依此推算，扶桑国的位置最远也很难超过从堪察加半岛到阿留申群岛的范围。希勒格等人考证扶桑国在库页岛^②，其说多穿凿附会，但就他所指扶桑国的地理位置在亚洲东部一点来说，较之指为美洲墨西哥，实更合理一些。

只是根据《梁书》的里程记载，孤立地来推断扶桑国的位置，当然还不能解决问题。还必须认真考虑一下五世纪时我国海上交通的实际状况和航渡太平洋的实际可能性。主张扶桑即墨西

^①张华：《博物志》卷一，聚藻堂印本。

^②《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冯承钧译，1928年，商务印书馆，第38—39页。